

论《新爱洛依丝》经典化的生成

徐雨霁

摘要：文学经典的生成并不是一个固定静态的价值判断，而是在一个持续时空中文学与非文学因素、文本本身与社会语境不断对话、重塑的过程。《新爱洛依丝》经典性的生成，与卢梭对启蒙运动的回应、书信体小说的流行、女性读者的兴起，以及对自然理念和社会风俗的全方位考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启蒙运动；书信体小说；女性读者；自然理念

作者简介：徐雨霁，女，硕士生。（香港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香港 九龙，999077）

中图分类号：I565.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6) 06-0116-06

《新爱洛依丝》是法国启蒙主义多元作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代表作，18世纪欧洲文学的核心经典。该书在1760年末得以完成，于次年2月出版发行。它将不合传统道德理念的师生之恋作为圣洁的“乌托邦”来歌颂，超越宗教观念与社会等级偏见，以充满激情与诗意的笔触抒发了人性的美好，更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与此后的爱情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书在当时法国巴黎出版，甚至还未出厂，就广为人知、流传甚远，更不要提出版之后受读者的欢迎程度。“书店里出租该书的价格竟高达每小时12个苏。在后来的四十年里，这部小说共再版了72次。”^[1]虽然这部小说最早在巴黎出版，但除本土影响之外，对于欧洲其他国家也具有超地域的吸引力，卢梭的朋友圣朗拜尔还将其手抄本念给波兰的国王听，它也成为了夫人们在卢森堡的宫廷里热谈的话题。尤其是在英格兰地区，该书传播速度之快之广也是出乎意料，“虽然这部小说第一次出版时间是在1761年，但在1760年的后期它已经在英格兰地区广泛流行着。”^[2]而相关的翻译也是及时而至，“三个月之后由贝克特和德杭特两位书商所翻译的第一版两卷译作，在1761年4月7日出版销售”^[2]，于同年这个翻译版本也出现在了爱尔兰的首都柏林。此外，由于该书迅速走红，1761年便出现了两个英语版本，同时“导致了一系列混乱的私人版本”大行其道。^[3]

18世纪50年代之后，“小说的内容从恶毒的护士、窃失的遗嘱以及英俊王子艰难冒险挣离开来”，“逐渐呈现出自然生活中真实的例子，正如托马斯·哈代所言即（小说）为寻常生活的罕见呈现”^[4]充满浪漫情怀的《新爱洛依丝》题材简单、主题集中，全部的情绪抒发与思想表达都由三四个人之间的163封书信加以表现，它抽离了人物细腻的描写，也避免刻意营造题外的话题，这也使这本小说在呈现事物方式上令人耳目一新。但它一经出版就被认为是巨作，“它描绘了日常生活，申明了道德意义，深入人心……如果曾有一部小说的出现即可获得最多的认可，并可以被认作是小说与小说家最佳的转折点的话，那就是让-雅克·卢梭的《新爱洛依丝》”。^[4]但是，这本书同样也没躲开法国讽刺天才伏尔泰的嘲笑，面对《新爱洛依丝》在法国的风靡和流行，伏尔泰却毫不犹豫地写道：“让-雅克找到了成功的诀窍，就是在这部动人的小说里，用三四页写下发生的事情，再加上大约一千篇道德说教”。^[5]无论是批评亦或者是赞美，都可见这本书的影响力。

《新爱洛依丝》与法国18世纪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卢梭个人的审美追求、道德伦理观念紧密联系，

并且随着时代阅读与相应文化思潮的崛起，不断赋予新的历史文化意义。其经典化过程可概括为三个因素：一是启蒙主义运动。这部小说中理性德操对情欲的克制是作者对启蒙主义理性的回应。“卢梭通过尖锐、清晰以及刺耳的方式来书写这种纯粹恋情，其潜在意图在于告诫法国中产阶级家庭”，^[6]即他“不仅仅着眼于‘与整个社会秩序有关的风俗和夫妻间的诚实，’而且还有一个更深远的目标，要达到‘社会的协调与社会的和平。’”^{[1](3)}但文中对12世纪爱洛依丝与阿贝拉尔师生恋原型的运用以及超越阶级伦理之爱的合法性表达，不仅仅呼应了他自身的情感经历，更是对后来浪漫主义爱情文学的产生开启了实践之门。二是文学体裁和女性读者的兴起。18世纪兴起的书信体小说契合当时西方主体性话语建构的历史环境。同时由于传统男女读者界限模糊和打破，女性教育的普及与女性阅读之参与，成为这本小说传播的一大动力。三是其自然主义理念。文本中，卢梭用肆意的笔触将人之心绪与大自然变化产生呼应，其“回归自然”的口号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唯理主义的补充与中和，不仅对浪漫主义兴起给予了源头性的影响，也孕育着“整体”、“融合”、“平等”的当代生态美学理念。此外，《新爱洛依丝》的经典性还体现在作者对教育观念、契约共同体建构和社会风尚的涉及，其浓郁的哲理性思考使这部小说成为卢梭个人的“百科全书”。

一、启蒙视野中《新爱洛依丝》的生成

18世纪的欧洲社会随着资产阶级不断成长，新兴资产阶级不断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掌控权，而反映在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主义运动不仅仅只是对古典主义文艺的反驳和批判，也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一次具有超地域和普遍性的反封建文化运动，为随后资产阶级革命扫清了思想的障碍。启蒙主义者以理性和知识为旗帜，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提倡人性和自然科学，反对宗教的愚昧与束缚，以此启蒙和解放他人。“启蒙因此不仅是个人用来保证自己思想自由的过程。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开使用相互重叠时，便有启蒙”。^[7]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洛克继续在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人之认知“白纸”理论，强调了后天经验对人思想形成的重要性。意大利的维科在《新科学》一书里，从语言学和哲学的角度考察人类发展史中对于真理与美的理解。而在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更是具有社会性。被誉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追求信仰、言论的自由，坚信理性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诗学，把对封建专制和维护其存在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其理性主义史学的题中之意”。^[8]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面宣扬了理性的法律精神是对于人类自由的维护。卢梭是法国启蒙主义者中最受争议的思想家。这种争议主要体现在作家对于文明与道德的双重思考以及对自由与回归自然的提倡上。

卢梭的思想与其说是对于启蒙主义运动的一种反叛，倒不如说是一种补充。1750年，卢梭以一篇名为《论科学与艺术》而逐渐开始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在书中，他从宏观人类发展格局入手，着眼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时期变化，论述世界东西各大国的崛起过程，从而得出了人生而自由平等，自由与自然人之本性，然而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科学艺术，却给社会带来了道德的灾难。1755年，让卢梭树敌更多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荷兰出版，这本书基本上确立了卢梭整个哲学理念，他认为人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人走向社会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的堕落。1754年，42岁的卢梭因为身心健康原因，他与妻子黛莱丝赴日内瓦，开始了《新爱洛依丝》的写作。

从《新爱洛依丝》这本书来看，与其说是一本爱的颂歌，不如说更像是一本道德与自然的宣言书。首先，卢梭运用曲折浪漫的爱情故事对启蒙主义运动做出自己的回应。作为自然神论者，卢梭把《新爱洛依丝》中主要的五位主人公（圣普乐、克莱尔、朱丽、爱德华绅士、沃尔玛）设置成为自然状态下的人，“自然状态的假定是卢梭文明批判的起点。这种假定主要不是对人的存在的历史描述，而是对人的本性的理论预设，其目的是确立文明评价的价值坐标和社会建构的先验基础”。^[9]不同于伏尔泰或

狄德罗的理性至上,卢梭视自然纯洁的人性是值得赞美的。在书中,人与人之间真情的流露,尤其是圣普乐与朱丽之间情深意切的情书传递,处处体现着作者对于人性之爱的体悟。正是对于情感的至上表达,强调自然人的纯真爱情,19世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乔治·勃兰兑斯指出:“这一特点,连带地推翻了法兰西古典时代在情绪问题上所持的理论的立场。这个理论以为所有高尚而纯洁的情绪,尤其是爱情,都是文明的产物,从而在文学作品中见不到自然和热情,只有伪饰的情操和阿谀的礼式”。^[10]贵族小姐与平民教师之间的爱情被神圣化、合法化,超越了等级门第的封建观念,而朱丽也成为了当时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典型。

小说主人公原型来源于12世纪爱洛依丝与阿贝拉尔师生相恋的故事。阿贝拉尔是当时著名神学家,作为私人家庭教师与学生爱洛依丝相爱,并生下私生子,举行了秘密婚礼。后阿贝拉尔受爱洛依丝家人报复而被阉割,二人各自进了修道院苦修,仅有书信往来,死后葬于同一个修道院墓地。阿贝拉尔是“哥利亚德”(Goliad,意为游荡诗人,云游者,泛指不安心学习的学生和放荡不羁的僧侣)的代表,并且是被公认的第一位知识分子。离经叛道的“哥利亚德”追求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是对当时宗教强大恐怖思想压制的反对与蔑视。圣普乐是朱丽的家庭教师,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知识修养的知识分子,是作家从阿贝拉尔的形象出发建构的,他与朱丽最大的差异在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朱丽则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此,圣普乐身上承担着卢梭鲜明的启蒙主义观点——反对宗教的束缚,追求自然人性。该小说原名是《阿尔卑斯山麓一小镇的二情人之书笺》,后改为《新爱洛依丝》,改名出版显然是有意让读者在文本阅读上进行互文对话。阿贝拉尔与爱洛依丝的悲剧既折射着中世纪宗教力量对于禁欲主义的推行,又反映出自然情爱力量对禁欲主义的突破。法国在思想文学史上对于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对浪漫爱情的争取也正是从12世纪骑士文学就开始了,进而奠定了法国民族性格中对于自然情怀和浪漫情愫的追求。虽然出身瑞士,但卢梭祖上是法国新教徒,其离开瑞士后所受的法国文化熏陶以及一切以情感为出发点的个体性格使他无意中秉承了这一浪漫传统,极力渲染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为写情的圣手,从而推动了后来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浪漫主义精神核心便是在理性中分离出了情感,在社会中分离出了自然,在人性中提升了自由,卢梭对这种精神的形成可谓功莫大焉。《新爱洛依丝》对歌德写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而拉马丁、夏多布里昂、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巨擘更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卢梭致敬。

爱情与自然人性是高贵的,但是理性的德操并不为卢梭所摒弃。正如小说中所言,“绝不要抛弃道德,绝不要忘记你的朱丽”。^{[1](188)}虽然不同于别的启蒙主义者认为道德的基础是理性,但是对于卢梭而言,道德的基础是“我们的灵魂深处”的良心。^[11]良心是人天生而有的善良,先于我们的知识经验和思考认知,是一种本能的德性。“人类道德的原则和基础并不是外在的,它就在于人类的心灵之中,是人类的道德情感和意志自律”。^[9]人通过自己的意志去改善自己也可以在其中获得自由。虽然朱丽与圣普乐可以在双方自由身的时候选择自由相恋,勇敢结合,但是面对他们的自然恋情,他们依旧彼此保留着深深的愧疚感。这部小说虽以中世纪不伦之恋为原型,但作者在情节和人物处理之上依旧做了巨大改变。尤其是阿贝拉尔最后被阉割,逐出了教堂,进了修道院,而圣普乐却在朋友与恋人的引导之下,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圣普乐的结局是身心逐渐健全,他的存在也是作者自然节制理念的体现。

此外,卢梭本人也利用朱丽与圣普乐的关系塑造了宗教与非宗教之间宽容和谐的互动,包括她成为沃尔玛夫人之后与丈夫之间对于上帝问题的探讨。作者试图建立一个宗教自由的社会,无论是否拥有信仰,都有权利追求幸福,因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完善。同样,这种宽容也体现在沃尔玛对于圣普乐与自己的妻子曾经的恋人关系上,以及克莱尔对于圣普乐的爱慕,爱德华绅士对于曾经沦落风尘的劳尔的救赎。正是这种宽容让人性的纯真面无限放大。从1757年到1758年,正好是卢梭与以狄德罗为首的启蒙主义者思想观点分歧争论最为残酷的时候,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相结合,可以将此

理解为卢梭对于狭义启蒙运动理性至上的回击，以及渴望彼此相互理解与宽容的心态。

二、书信体裁与女性读者的参与

卢梭之所以采用书信体方式进行创作，一方面是对爱洛依丝与阿贝拉尔的爱情书简在形式上回应，另一方面也与其写作内容私密性相关。作为近代书信体小说的创始人，塞缪尔·理查逊以其作品《帕米拉》开创了英国感伤主义文学之先河，他在作品中探讨爱情与道德、女性与婚姻等敏感话题，这种写作风格随后即受到了欢迎。卢梭承继这一体裁，但将道德人格化的意图也让他从当时书信小说一味以阴柔女性悲惨经历和传奇艳遇为内容的描写中脱离开来。在美国文学评论家保尔·德曼看来，“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正如寓言故事里的人物一样，都是某种抽象概念的替代物。例如，朱莉代表了贞洁，圣普乐代表了忠诚，德·沃尔玛先生代表了宽容，克莱尔代表了友谊，等等。小说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传达一种道德说教，这也是卢梭在第二篇序言中一再强调的……如此看来，《新爱洛伊丝》的寓言说教成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12]这种浓郁的说教色彩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传统书信体裁小说在题材和内容上的弥补和拓展，使书信体写作更具有对话社会的可能。

从宏观社会发展上来看，书信体小说是伴随着资产阶级自我主体性的逐渐建构而出现的文学体裁。作为一种被建构的话语，“近代西方的书信体小说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揭示主体的内心隐私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西方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它第一次以亲切的口气、私密化的情感和通俗易懂的文字，为近代小说建立起一个记录个人隐私生活的叙事模式，投合了新兴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欲望和趣味，从而参与了一种完全属于近代‘市民公共领域’的隐私话语的建构。”^[13]小说的出现离不开印刷技术的进步、教育的普及，然而书信小说的盛行因为涉及婚姻、性爱的内容而往往为女性读者所喜欢，同时也意味着当时女性教育的展开。此外，阅读书信体常伴随着窥视欲的满足感，这就为当时极度理性化的社会增加了一定的感性空间。“书信体小说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与人交流的必要性，人们非常迷恋于‘自我’与‘知己’的沟通关系。在崇尚诚信的社会背景下，书信体小说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14]书信体小说往往以第一人称视角，提供作者写作的主观性和读者解读的自由性。第一人称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解读，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叙事视角的角度，对于“我”的关注超越了对于“他者”的客观描述，也暗示着资产阶级自信心的确立，这也使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对于作品中“有我之境”的想象，关注个人情感表达，提升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

《新爱洛依丝》作为具有女性视角的小说，在题材上满足与符合了女性阅读的视野。因为即使当时女性教育开始普及，但是依旧无法在认知体系上完成与男性视野的对接。而将这本具有哲理性的小说披上浪漫爱情的外衣，必然成为当时妇女阅读的首选。“现代小说在18世纪的发展从来无法与性别问题相分离。从启蒙批评通过女性感知联系小说主体与情感审美后的两个世纪中，评论家已经将不同的文学风格类型对应至相应的性别中”。^[15]18世纪的欧洲社会新旧阶级明显交替，伴随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而从哪里寻找到一个可以完成规训、追求以及令女性向往接受的对象？卢梭为此塑造了一个因为爱情而失足的朱丽，而她最后的神圣升华又与其心灵高贵、接受道德、追求自我救赎相关。朱丽一方面超越传统道德的女人形象（贵族阶级的审美），如卢梭坦言的，“它（小说）将令风雅女子不快，又令正经女人愤慨……”^{[1](5)}；另一方面，朱丽最后回归道德伦理的轨迹，又是卢梭试图勾勒被社会压抑至边缘已久的女性教育（阅读）的指向，是对新兴资产阶级家庭和社会建构诉求的妥协与认同。

三、“回归自然”理念与“契约共同体”的建构

“回归自然”一般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回归人自然的天性，二是回归纯粹的大自然，从腐朽的社会

中脱身去寻求自然的美与崇高。卢梭也知道人不可能完全回归自然,成为自然人,他之所以提出“回归自然”,是以自然状态为评判现实社会的出发点,是为了对抗建立在近代科学话语上的、极度唯物、理性的启蒙主义,是对功利化社会和机械物质文明的极大反驳,是规避人的异化的一种理念。

诚如一些学者所言,“‘返归自然’、‘尊重自然’是卢梭浪漫主义中生态思想的核心体系,这不仅在当时就超越了同时代的很多文人学者,而且对当今世界所面对的生态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6]回归自然,对卢梭而言也就是躲开病态的上层文明社会,在与大自然的共存中恢复真切的人性。所以,在《新爱洛依丝》中,他有意将出身阶层迥异的恋人置身于环境优美的阿尔卑斯山麓之中,生命本源的爱情与朴素自然的环境相对应,在这样的环境中男女主人公完成了彼此身心的融合。在朱丽对爱丽舍的管理中,更是充分反应出“整体”、“融合”、“平等”的生态美学观。爱丽舍原为古希腊和拉丁神话中的幸福之所,在冥界最外层,是上古英雄与有德之人的理想乐土,美丽祥和生活的象征。小说中爱丽舍原先是一片荒地,绿草稀少、树林稀疏,而七八年之后,等到圣普乐再次回来,“仿佛踏进了大自然中最原始最孤立之地”,^[17]花园里花草繁盛,种类繁多,任其发展,不加以人为的干涉,更是不故意堆砌栅栏,只是加以适当的打理。因地制宜地选择水渠开发,对于自然生物(鸟、鱼)的尊重和一定的自然环境空间,不允许他人近距离地接近,甚至朱丽戏称鸟是自己的主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互相尊重,彼此相爱,勤俭持家,善待自然,善待仆人、农人。他们又先后邀来圣普乐、朱莉表妹克萊尔,甚至圣普乐的好友爱德华爵士。朱莉之家俨然是卢梭理想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的象征”。^[18]爱丽舍的设计基于人与自然相互协作的关系,是具有诗学审美的。在自然设计的过程中,也将自我的意识主体化、自然化,具有浓郁的个人主义气息;卢梭在此自然化的环境下开辟了心理描述的新领域。这对于启蒙时代理性框架下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同时也是对当时乃至当代自然环境问题提出了一种诗意化的解决手段。此后,正如冯寿农所论述的,“卢梭所返回的‘自然’实际上是一种附魅的自然本体,这是人类一种古老的自然观,即认为自然皆有灵魂的。这种自然观产生于先民们依赖于自然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方式……不仅影响浪漫主义文学,也开拓了法国生态文学”。^[19]故此,从19世纪乔治·桑的《魔沼》、20世纪米歇尔·图尼埃的《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乃至当代的勒克莱齐奥的《沙漠》,皆可以看成是对卢梭生态美学的衍生与续写。

“回归自然”不仅仅只是对客观自然的复返,更是将自然作为一种思考社会的原则。“对于大多数的浪漫主义者,尤其是卢梭而言,始终坚信自然的理念发挥着规范和引导的作用”。^[20]故此,卢梭“从自然主义哲学观出发,认为男女有别是大自然的安排,应该遵循自然的指导,按男女差异进行教育,这与现代教育观是吻合的,在教育史上无疑是个重大进步,为女子教育的发展,进而为女性追求自由平等做出了重大贡献”。^[21]卢梭认为女性生来温柔娴静,而对其教育应该从培养一个贤淑端庄的妇人入手。朱丽便成为这种教育最为成功的典范。教育的核心必须是顺应人的天性,关注审美经验与道德的完善,提倡情感大于理智的开发。卢梭借朱丽之口吻认为在孩童的儿时,母亲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陪伴孩子成长上,而父亲则在孩子青年时期承担起理智和正义的感化。而且卢梭还以朱丽与沃尔玛的男女组合为例,同样树立了依附式家庭教育的榜样,朱丽承担着生活的责任,而沃尔玛则负责对外的沟通,朱丽尊重并且敬佩自己的丈夫,丈夫也宽容与理解自己的妻子,朱丽的家庭是一个崭新的理想家庭,“它会是理论设想中的、《社会契约论》所塑造新社会的基石”。^[22]

在社会管理上,卢梭虽然没有在这本书中对社会提出整体性的思考,但是他通过沃尔玛一家的主仆关系,反应折射出他对整个和谐社会的构思,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阶级关系的淡化。比如,沃尔玛对于仆人的挑选,往往给淳朴的农民以机会。在组织管理上,合理安排工作分量,将个人价值最大化。仆人一方面受到主人在人格上的尊重,而主人也在道德上以身作则,激发了仆人为之工作的最大动力。正是如此才展示出卢梭所关注的平等自由的理念,“卢梭的契约共同体是指向未来的并予以

完善个性从而使个人的自然状态的绝对存在转换为相对的共同体的存在，这种存在并不剥夺个人的任何自由，反而给他们基于公意之下的一种平等关系之上的自由”。^[23]而朱丽定期举办舞会，给女仆提供自己所做的点心，不偏袒任何人，不憎恨那些为了私利而诋毁他人的仆人，从而有效避免了仆人之间因为私人恩怨而导致整个家庭秩序的破坏。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卢梭对于美好社会共同体的一大憧憬，这对我们今天建构和谐生态社会也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总之，《新爱洛依丝》的经典性是多方面的，而作为卢梭诸多思想的实体化演绎，无疑是其经典化生成的基本要素。除上面所述以外，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即作家对社会风尚的描绘，使得该小说亦成为研究法国启蒙时代风貌的重要历史性文本。比如圣普乐在巴黎给朱丽写信时，作者借圣普乐之手描述了巴黎社会风俗，呈现了当时贵妇人雍容的穿着，戏院剧场中混乱的场面，以及妇女偷情出轨的风流韵事等等，这对于研究18世纪的法国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法国] 让-雅克·卢梭. 新爱洛依丝（上）[M]. 陈晓卿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3-4.
- [2] Warner, James H.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Reactions to the Nouvelle Héloïse [J]. *PMLA*, 1937 (3): 803.
- [3] G. G. Barber. Two English Editions of “La Nouvelle Héloïse”, 1761 [J].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1961 (2): 227.
- [4] William Mead. La Nouvelle Héloïse and the Public of 1761 [J]. *Yale French Studies*, 1961 (28): 14.
- [5] 吴岳添. 世界末的巴黎文化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33.
- [6] Tony Tanner. Julie and “La Maison Paternelle”: Another Look at Rousseau’s “La Nouvelle Héloïse” [J]. *Daedalus*, 1976 (1): 23.
- [7] [法] 福柯. 福柯集 [M]. 杜小真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532.
- [8] 杨芳. 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 [J].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 (4): 26.
- [9] 刘莘. 文明批判：卢梭与启蒙运动 [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3): 30-31.
- [10] 秦治全. 魅力与永恒：西方文学史中典型女性形象研究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44.
- [11] [法] 让-雅克·卢梭. 爱弥儿（下）[M]. 李平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14.
- [12] 昂智慧. 阅读的危险与语言的寓言性——论保尔·德曼对卢梭《新爱洛依丝》的解读 [J]. 外国文学研究，2005 (1): 165.
- [13] 张德明. 近代西方书信体小说与主体性话语的建构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3): 38.
- [14] [法] 弗雷德里克·卡拉. 书信体小说 [M]. 李俊仙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7.
- [15] William Ray. Reading Women: Cultural Authority, Gender, and the Novel: The Case of Rousseau [J].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994 (3): 421.
- [16] 王燕、贾芳. 卢梭自然生态思想浅析 [J]. 青年文学家，2014 (1): 116.
- [17] [法] 让-雅克·卢梭. 新爱洛依丝（下）[M]. 陈晓卿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72.
- [18] 胡向玲. 爱丽舍：卢梭理想中的诗意栖居——以现代生态理念品读《新爱洛依丝》[J]. 现代语文，2006 (7): 77.
- [19] John E. Smith. Rousseau, Romant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J]. *Yale French Studies*, 1954 (13): 55.
- [20] 冯寿农. 卢梭的自然观开拓了法国生态文学——再读《论科学与艺术》[J]. 法国研究，2014 (1): 64-69.
- [21] 王晓瑞. 卢梭的女性教育观——读《朱莉，或新爱洛依丝》[J]. 快乐阅读，2011 (21): 191.
- [22] Kenneth Wain. *On Rousseau: An introduction to his radical thinking o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M].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1: 18.
- [23] 邵发军.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研究 [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34.

On the Canonization of *Julie , or the New Heloise*

Xu Yuji

The generation of literary canonization is not a kind of static value judgment, but rather a reshaping process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literary and non-literary factors, between the text itself and the social context in a time-space continuum. The canonization of *Julie , or the New Heloise*,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Jean-Jacques Rousseau's responses to the Enlightenment, the popularity of epistolary novels, the rise of a female readership, as well as Rousseau's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natural principles and social customs.